

詩言志辨

朱自清著

詩言志辨

開明書店印行



序

西方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我們的「史」的意念，也改變了我們的「文學」的意念。我們有了文學史，並且將小說、詞曲都放進文學史裏，也就是放進「文」或「文學」裏；而曲的主要部分，劇曲，也作為戲劇討論，差不多得到與詩文平等的地位。我們有了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這是我們的第一部文學專史或類別的文學史。新文學運動加強了新的文學意念的發展。小說的地位增高，我們有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詞曲差不多昇到了詩裏；我們有劉毓盤先生的詞史。雖然只是講義，而且並未完成，還有王易先生的詞曲史。民間的歌謠和故事也昇到了文學裏，「變文」和彈詞等也跟着昇，於是乎有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這裏特別要提出的是，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稱為「詩文評」的，也昇了格成為文學的一類。陳鍾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僅後於宋元戲曲史，但到郭紹虞先生的那一本出來，纔引起一般的注意，雖然那還只是上卷書。

從目錄學上看，俗文學或民間文學的歌謠部分雖然因為用作樂歌，早得著錄，但別

的部分差不多從不登大雅之堂。詞曲發展得晚，著錄得也晚。小說發展雖早，從前只附在子、史兩部裏，我們所謂小說的小說，到明代纔見著錄。詩文評的系統的著作，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都作於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總集」類的末尾；宋代纔另立「文史」類來容納這些書。這「文史」類後來演變為「詩文評」類。著錄表示有地位，自成一類表示有獨立的地位；這反映着各類文學本身如何發展，並如何獲得一般的承認。

一類文學獲得一般的承認，卻還未必獲得與別類文學一般的平等的地位。小說、詞曲、詩文評，在我們的傳統裏，地位都在詩文之下；俗文學除一部分古歌謠歸入詩裏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地位。西方文化輸入了新的文學意念，加上新文學的創作，小說、詞曲、詩文評，纔得昇了格，跟詩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統文學。但俗文學還只是「俗」文學；雖是「文學」，還不能放進正統裏。所謂詞曲的平等地位，得分開來看。戲曲是歌劇，屬於戲劇類，與話劇平分天下。詞和散曲可以說是詩類，但就史的發展論，範圍自然是文學批評。前些年蘇雪林女士曾著專文討論，結論是正的。現在一般似乎都承認

了詩文評即文學批評的獨立的平等的地位。

文學史的發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學的發展，一面也跟着文學的發展。這些年來我們的史學很快的進步，文學也有了新的成長，文學史確是改變了面目。但是改變面目是不夠的，我們要求新的血和肉。這需要大家長期的不斷的努力。一般的文學史如此，類別的文學史更顯然如此。而文學批評史似乎尤其難。一則一般人往往有種成見，以為無創作才的纔去做批評工作，批評只是第二流貨色，因此有些人不願意研究它。二則我們的詩文評斷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則我們的現代文學裏批評一類也還沒有發展；在各類文學中它是最落後的。現在我們固然願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的仔細的考辨，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這是從小處下手。希望努力的結果可以闡明批評的價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見，並堅強它那新獲得的地位。

詩文評的專書裏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評，文體的史的發展，以及一般的理論，也包含着一些軼事異聞。這固然得費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專書以外，經史子集裏還有許

多，即使不更多，詩文評的材料，直接的或間接的。前者如「詩言志」，「思無邪」，「辭，達而已矣」，「脩辭立其誠」；後者如莊子裏「神」的意念和孟子裏「氣」的意念。這些纔是我們的詩文評的源頭，從此江淮漢流貫我們整個文學批評史。至於選集、別集的序跋和評語，別集裏的序跋、書牘、傳誌，甚至評點書，還有三國志、世說新語、文選諸註裏，以及小說、筆記裏，也都五光十色，層出不窮。這種種是取不盡、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輕心，謹嚴的考證、辨析，總會有結果的。

我們的文學批評似乎始於論詩，其次論「辭」，是在春秋及戰國時代。論詩是論外交「賦詩」，「賦詩」是歌唱入樂的詩。論「辭」是論外交辭命或行政法令。兩者的作用都在政教。從論「辭」到論「文」還有一段曲折的歷史，這裏姑且不談；只談詩論。「詩言志」是開山的綱領，接着是漢代提出的「詩教」。漢代將「六藝」的教化相提並論，稱爲「六學」；而流行最廣的是「詩教」。這時候早已不歌唱詩，只誦讀詩。「詩教」是就讀詩而論，作用顯然也在政教。這時候「詩言志」，「詩教」兩個綱領都在告訴人如何理解詩，如何受用詩。但詩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說過「論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確也說過知人論世。毛公釋「興詩」，似乎根據前者，後來稱爲「比興」；

鄭玄作詩譜，論「正變」，顯然根據後者。這些是方法論，是那兩個綱領的細目，歸結自然都在政教。

這四條詩論，四個批評的意念，二千年來都曾經過多多少少的演變。現代有人用「言志」和「載道」標明中國文學的主流，說這兩個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國文學史。「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兩者並不衝突；現時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詩教」原是「溫柔敦厚」，宋人又以「無邪」爲「詩教」；這卻不相反而相成。「比興」的解釋向來紛無定論；可以注意的是這個意念漸漸由方法而變成了綱領。「正變」原只論「風雅正變」，後來卻與「文變」說聯合起來，論到詩文體的正變；這其實是我們固有的「文學史」的意念。

這本小書裏收的四篇論文，便是研究那四條詩論的史的發展的。這四條詩論，四個詞句，在各時代有許多不同的用例。書中便根據那些重要的用例試着解釋這四個詞句的本義跟變義，源頭和流派。但比興一篇卻只能從毛詩下手，沒有追溯到最早的源頭；文中解釋「賦」「比」「興」的本義，也只以關切毛詩的爲主。「賦」「比」「興」原來大概是樂歌的名稱，和「風」「雅」「頌」一樣。這一層已經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學批

詳無關，我們可以不論。毛詩的解釋跟作詩人之意相合與否，我們也不論。因為我們要解釋的是「比興」，不是詩。

本書原擬名爲「詩論釋辭」，「辭」指詞句而言。後來因爲書中四篇論文是一套，而以「詩言志」一個意念爲中心，所以改爲今名。詩言志篇跟比興篇是抗戰前寫的，曾分別登載語言與文學和清華學報。詩教篇跟正變篇是近兩年中寫的。前者曾載入文科學學報；後者也給了清華學報，但這一期學報本身還未能印出。已發表的三篇都經過補充和修正；詩言志篇差不多重寫了一回。不過疏陋的地方必還不少，如承方家指教，深爲感謝。

目 錄

詩言志

(一) 獻詩陳志 ······

(二) 賦詩言志 ······

一四

(三) 教詩明志 ······

二〇

(四) 作詩言志 ······

二九

比興

(一) 毛詩鄭箋釋興 ······

四九

(二) 興義溯源 ······

六五

(三) 賦比興通釋 ······

八〇

(四) 比興論詩 ······

九七

詩教

(一)六藝之教

一〇七

(二)著述引詩

一一四

(三)溫柔敦厚

一二七

正變

(一)風雅正變

一四四

(二)詩體正變

一六三

詩言志

(一) 獻詩陳志

今文尚書堯典記舜的話，命夔典樂，教胄子，又道：

詩言志^①，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鄭玄注云，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②。

這裏有兩件事：一是詩言志，二是詩樂不分家。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也有「詩以言志」的話。那是說「賦詩」的，而賦詩是合樂的^③，也是詩樂不分家。據顧頽剛先生等考證，堯典最早也是戰國時纔有的書^④。那麼，「詩言志」這句話也許從「詩以言志」那句話來^⑤，但也許彼此是獨立的。

說文三上言部云：

詩，志也。「志發於言」^④从「言」，「寺」聲。

古文作「訛」，从「言」，「ㄓ」聲。楊遇夫先生（樹達）在釋詩一文裏說：「『志』字从『心』，『ㄓ』聲，『寺』字亦从『ㄓ』聲。『ㄓ』、『志』、『寺』古音蓋無二。……其以『ㄓ』爲『志』，或以『寺』爲『志』，音近假借耳。」又據左傳昭公六年韓宣子「賦不出鄭志」的話，說「鄭志」卽「鄭詩」；因而以爲「古『詩』『志』二文同用，故許（慎）徑以『志』釋『詩』」^⑤。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裏更進一步說道：

志字从「ㄓ」，卜辭「ㄓ」作「ㄓ」，从「止」下「一」，象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ㄓ」本訓停止。……「志」从「ㄓ」从「心」，本義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說是藏心裏。

他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從這裏出發，他證明了「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⑥。但是到了「詩言志」和「詩以言志」這兩句話，「志」已經指「懷抱」了。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云：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

捨，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孔穎達正義說：「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爲情，情動爲志，情、志一也。」漢人又以「意」爲「志」，又說志是「心所念慮」，「心意所趣向」，又說是「詩人志所欲之事」^④。情和意都指懷抱而言；但看子產的話跟子太叔的口氣，這種志，這種懷抱是與「禮」分不開的，也就是與政治、教化分不開的。

「言志」這詞組兩見於論語中。公治長篇云：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⑤，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陳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先進篇記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各言其志」，語更詳。兩處所記「言志」，非關修身，即關治國，可正是發抒懷抱。還有，禮記檀弓篇記晉世子申生被驪姬讒害，他兄弟重耳向他道，「子蓋（盍）言子之志於公乎？」鄭玄注，「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這也是教他陳訴懷抱。這裏申生陳訴懷抱，一面關係自己的窮通，一面關係國家的治亂。可是他不願意陳訴，他自己是死了，晉國也跟着亂起來。這種志，這種懷抱，其實

是與政教分不開的。

詩經裏說到作詩的有十二處：

一、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魏葛韙）

二、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陳墓門）

三、是用作歌，「將母」來懿。（小雅四牡）

四、家父作誦，以究王謗。（小雅節南山）

五、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六、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巷伯）

七、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八、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卷阿）

九、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

十、雖曰「匪予」，旣作爾歌。（大雅桑柔）

十一、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崧高）

十二、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大雅烝民）

這裏明用「作」字的八處，其餘也都含有「作」字意。（一）最顯，不必再說。（二）傳云，「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旣作，可使工歌之，是謂之告。」經典

釋文引韓詩，「訊，諫也」。說文言部，「諫，數諫也」。段玉裁云，「謂數其失而諫之。凡譏『刺』字當用此。」（八）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九）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汝）○○。」

這些詩的作意不外乎諷與頌，詩文裏說得明白。像「以爲刺」「以訊之」「以究王謔」「以極反側」「用大諫」，顯言諷諫，一望而知。四牡篇的「『將母』來諗」，箋云「諗，告也○○。○○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與巷伯的「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四月的「維以告哀」，都是自述苦情，欲因歌唱以告於在上位的人，也該算在諷一類裏。柔柔的「雖曰『匪予』，卽作爾歌」，箋云，「女（汝）雖瓶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汝）所行之歌，女（汝）當受之而無悔。」那麼，也是諷了。爲頌美而作的，只有卷阿篇的陳詩以「遂歌」和尹吉甫的兩「誦」。卷阿傳說「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陳志」就是「言志」。因爲是「獻詩」或贈詩（如崧高、烝民），所以「言志」不出乎諷與頌，而諷比頌多。

國語周語上記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邵公諫道：

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晉語六趙文子冠，見范文子，范文子說：

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辨祿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記師曠對晉平公的話，大略相同；但只作「瞽爲詩」，沒有明說「獻詩」。

從這幾段記載看，可見「公卿列士的諷諫是特地做了獻上去的，庶人的批評是給官吏打聽到了告誦上去的」。獻詩只是公卿列士的事，輪不到庶人。而說到獻詩，連帶着說到瞽、矇、瞍、工，都是樂工，又可見詩是合樂的。

古代有所謂「樂語」。周禮大司樂：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這六種「樂語」的分別，現在還不能詳知，似乎都以歌辭爲主。「興」「道」（導）似

乎是合奏，「諷」「誦」似乎是獨奏；「言」「語」是將歌辭應用在日常生活裏。這些都用歌辭來表示情意，所以稱爲「樂語」。周禮如近代學者所論，大概是戰國時作，但其中記述的制度多少該有所本，決不至於全是想像之談。「樂語」的存在，從別處也可推見。國語周語下云：

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周頌）。單之老送叔向（肸的字），叔向告之曰：「……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是道成王之德（道文武成其王德）也。……單子儉、敬、讓、吝，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韋昭解道，「『語』，宴語所及也。『說』，樂也」。似乎「昊天有成命」是這回享禮中奏的樂歌，而單靖公言語之間很賞識這首歌辭。叔向的話先詳說這篇歌辭——詩，然後論單靖公的爲人，并預言他的家世興盛。這正是「樂語」，正可見「樂語」的重要作用。論語陽貨篇簡單的記着孔子一段故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歷來都說孔子「取瑟而歌」只是表明並非真病，只是表明不願見。但小病未必就不能